

自序

多年以前，我為《光明日報》寫專欄，後將該專欄的作品結集成冊，出了一本《橫生斜長集》，作為《說文談史叢書》之一，據說賣得還不錯。是啊，此類文章，沒有八股套腔，不受條條框框約束，敘事可，抒情可，議論、考辨亦可，在極其有限的篇幅中要言不煩、縱馬由繮、信筆寫來、揮灑自如。這類文字，作者也許不易寫，但讀者卻易讀。茶餘飯後、車上舟中、一編在手，無沉重難舉之感；一篇入目，幾分鐘即可讀完，主旨立悟，無費時耗目、頭昏腦脹之苦，而有長知識、啟心智、娛性情之效。讀此類書，誠一樂也。後來，我在從事主業，寫作長文、大書之餘，偶有所感，也繼續寫點既短且小的隨筆，其體裁、風格大體與拙作《橫生斜長集》中的文章類似。我還聯絡過幾個朋友，共同寫作《小文叢書》，在序言中高度推崇小文，論證千古以來，家喻戶曉、膾炙人口、傳誦不衰的名文佳作，大都是小文。

呈獻在讀者面前的這本《東暢樓隨筆》在前作的基礎上增刪了部分文章，並重新進行了修訂。最初，本擬定名為《道古說今集》，然而，轉念一想，“道古”固屬著者本行，“說今”卻非敝人專業，可能涉“雷”，似乎不宜突出，還以藏拙為佳。之所以定名為《東暢樓隨筆》者，取地名也。敝人工作機構在北京東廠胡同，明代為特務機關，名字、形象都不好，因取其諧音之第四聲，作“東暢”，以示躬逢改革開放年代，敝人自1978年調入新機構以後，命運自此轉折，心情舒暢、愉快也。

是為序。

楊天石

2025年7月

“天王聖明”與楊繼盛之死

韓愈這個人，很有點道學家的氣味。例如，他寫過一首詩，題為《拘幽操》，是以周文王的口氣寫的。詩云：“目窈窕兮，其凝其盲。耳聵聵兮，聽不聞聲。朝不日出兮，夜不見月與星。有知無知兮，為死為生。嗚呼！臣罪當誅兮，天王聖明。”史載，周文王被商紂王囚禁於羑里時，曾鼓琴作歌，以解憂愁，韓愈的這首詩就是揣想當時情景所擬作的歌詞。按說，紂是昏君，文王是大聖人，紂囚禁了文王，當然是冤獄無疑。文王總該有點牢騷吧？然而沒有，仍然念念不忘“天王聖明”，自認“臣罪當誅”，完全符合道學家的倫理準則：“臣子無說君父不是的道理。”所以，無怪乎北宋的程頤、南宋的朱熹都大誇韓愈這首詩寫得好，說是：“通文王意中事，前後之人，道不到此。”

我想起了明朝的楊繼盛，也就是楊椒山。今天的讀者對此人可能感到陌生，但在明朝中葉，他是鼎鼎大名的。話說，那時正值嘉靖皇帝當朝，權相嚴嵩當國，楊繼盛在上皇帝書中，彈劾嚴嵩有十大罪、五大奸，要求皇帝除此“內賊”，重則按律論處，輕則勒令退休。但是，嚴嵩聖眷正隆，皇帝看了奏章之後，不但不去觸動嚴嵩一根汗毛，反而將楊繼盛投到獄裏，下令“杖之百”。明代的廷杖是一種對官吏的酷刑。輕則殘廢，重則送命，很可怕的。執行之前，一位同情者給楊繼盛送來一塊蟒蛇膽，要他和酒服下。楊繼盛卻說：“本人自己有膽，要蛇膽何用！”打完之後，楊繼盛真是應了舊小說中的兩句話：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直到半夜，才甦醒過來。楊繼盛大概有點治療杖刑的知識，懂得必須將腐血放出來。但是獄中既無醫生，也沒有刀子，楊繼盛便打碎茶

盅，將碎片扎入體內放血，一直扎了五六十個窟窿，流出了十數碗血，神智才清楚了。過了一些時候，左腿潰腫，楊繼盛又親自操刀，將腐肉一一割去。獄卒在旁看得心驚膽戰，感嘆說：“當年關公刮骨療毒還要靠別人，不能像老爺這樣自割！”確實，楊繼盛很勇敢。我想今天的讀者大概也會為之感嘆的。

但是，楊繼盛其人的思想卻並不值得感嘆。他在獄中有一首《苦陰雨》詩：“捫胸問心心轉迷，仰面呼天天不語。混宇宙兮不分，藹煙霧兮氤氳。西風起兮天霽，掛遠樹兮夕曛。聚還散兮暮雲平，晦復明兮日初晴，何時回怒今天王聖明？”這位楊繼盛無疑是讀過韓愈的《拘幽操》的，所以他記得“天王聖明”這一名句。儘管楊繼盛捱了刻骨銘心的一百杖，然而，他還是希望嘉靖皇帝有朝一日，回怒作喜，將他釋放出獄。不幸的是，嘉靖皇帝並不“聖明”，下詔將他“棄市”。臨刑之前，楊繼盛又寫了兩首詩：“浩氣還太虛，丹心照萬古。生前未了事，留與後人補。”“天王自聖明，制度高千古。平生未報恩，留作忠魂補。”

古人作詩，主張“怨而不怒，哀而不傷”。可見，有點怨氣是不妨事的。然而，楊繼盛的詩卻一丁點兒怨氣也沒有，還在表示，要在死後報答“聖明”的“天王”，這自然是可以使封建統治者放心，並且高興的。所以嘉靖皇帝雖然殺了楊繼盛，繼位的隆慶皇帝卻下令嘉獎，封他為中順大夫、太常寺少卿，並且給了一個謚號：忠愍。到了清朝，順治皇帝不僅專門寫了一篇《表忠錄論》，表彰楊繼盛可以“與龍逢、比干先後合轍”，而且坦率地承認，他喜歡楊繼盛臨刑前的兩首詩，“不勝三嘆”。

韓愈的思想到近代才受到了挑戰，柳亞子早年詩云：“臣罪當誅緣底事？昌黎誤盡讀書人。”這是在明確地批判韓愈的《拘幽操》了。其實，韓愈所“誤”的何止是楊繼盛一類的“讀書人”。舊時奴才每逢主子發怒時總有一句口頭禪，叫作“小的該死”，這不正是“臣罪當誅”的普及版嗎？所以，儘管我知道韓愈提倡古文運動，“文起八代之衰”，但是，感情上總有點兒不大喜歡他。

金剛實為平剛

1907年10月17日，在東京的中國革命黨人和立憲派之間，有過一次武鬥。其經過如下：

政聞社在東京錦輝館召開成立大會，梁啟超在保鏢的護持下登台演說：“今朝廷下詔，刻期立憲，諸君子宜歡喜踴躍。”正在此際，革命黨人一聲喊打，400多人蜂擁而上，嚇得梁啟超從樓梯上墜下。關於參加這次武鬥的革命黨人，據章太炎的《政聞社社員大會破壞狀》一文記載，有張繼、金剛、陶成章等。其中，金剛表現最為突出。當張繼躍上講台時，有一個政聞社員抓起茶几迎拒，“金剛自後搯其肩”，持茶几的好漢無法動彈，張繼得以上台，歡聲雷動。

這位金剛是誰呢？遍查留學生名錄，不得其人。前閱汪東所撰《張繼墓誌銘》中云：“（保皇黨）大會徒眾於錦輝館，示欲與同盟抗。公廁其中。其魁梁啟超方登台，公奮起大呼，躍而上，貴築平剛從之，擊啟超墮台下。”（《“國史館”館刊》一卷二號）據此，可知金剛實為平剛。

平剛，字少璜，貴州貴築人，時任同盟會貴州分會會長。

紀念與超越

——新文化運動 100 週年感言

如果以陳獨秀 1915 年在上海創辦《青年雜誌》為標誌，那麼，今年是新文化運動 100 週年。

從那個時期以來，中國文化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，取得了長足的發展。那個時期以前，中國文化籠統地被稱為“舊文化”；那個時期以後，特別是“五四”愛國運動之後，中國文化被稱為“新文化”。

一百多年前，中國可以說正“風雨如磐”。袁世凱為了復辟帝制，開歷史倒車，正大力鼓吹“尊孔”，孔教會一類團體遍於各地，請定孔教為國教的呼聲響遍國中。與此相聯繫，“九天玄女娘娘”、“關聖大帝”，甚至“蛇精”一類偶像仍然受到祭祀和禮拜。為了保衛和繼承辛亥革命的成果，推動中國文化轉型，促進中國歷史向現代文明國家發展，陳獨秀、李大釗、魯迅、胡適、錢玄同等一批文化人，倡導新文化運動，喊出了“民主”和“科學”兩大口號，於是，舊思想、舊文化的神聖光輪被剝奪，新思想、新文化如雨後春筍般發生、發展，波濤洶湧，莫之能禦，終於造成了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嶄新局面。可以說，100 年前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強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發展，功德無量，值得中國人民世代永遠紀念。任何“造成中國文化斷裂”、開 20 世紀 60 年代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先河一類指責都是錯誤的，是與歷史事實不符的。

當然，正像世界上沒有完美無缺的人物一樣，任何政治運動、文化運動都可能有缺點，有不足，有偏頗和弊端。

回首百年，新文化運動的最大缺點是思想上的絕對化，形而上學：壞的絕對壞，好的絕對好。這突出地表現在當時的先行者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評價上。

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領風騷數百年。”任何文化都產生和出現在特定的時空環境中，因而具有強烈的時代性。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於中國的農業社會，它有著豐富、燦爛的內容，幾千年來，它服務於中國社會，孕育、培養了中國人的思想、性格，成為中華民族的靈魂與民族精神的主要內涵，但是，它不適應現代工業社會的需要也是必然的。“執古方以藥今病”，不可取；用“死人”捆住“活人”，不可取；利用舊文化的糟粕拉著車屁股向後，更不可取。因此，打破對舊文化的迷信，反對利用舊文化開歷史倒車，完全正確，完全必要。沒有這種批判，中國人的思想就無法解放，腳步無法邁開，但是，這種批判必須是充分說理的、全面的、有分析的，是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，闡釋其內容，分解其精華與糟粕，評價其是非功過，而不是全盤否定、全盤打倒。遺憾的是，“五四”先行者恰恰犯了這樣的錯誤。今天看來，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顯然批判過苛、過多。例如有人提出，從傳統文化中找精華就是“從牛糞中找香水”；有人主張不讀中國書、少讀中國書，“將綫裝書統統扔到廁所去”；個別人甚至主張廢漢字、漢語等，就都是極端化、絕對化的錯誤言論。

世界是豐富的、多彩的，有著不同的人種和民族。每個人種、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，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，在世界文化寶庫中都做出了獨特的、不可磨滅的貢獻。這些各具特色的文化之間相互借鑒，相互吸收，將會使各民族的文化發展得更為全面、更為豐富、更為多姿多彩。文化發展的大忌是閉關鎖國、孤芳自賞，其結果是不能取人之長、補己之短，其結果必然是自我萎縮、枯竭衰亡。

歐洲世界和亞洲世界的地理位置不同，社會條件不同，其文化也和亞洲世界不同。早在遠古，歐洲人就創造了以希臘為代表的輝煌的古代文明。自英國工業革命起，英國、法國、德國，以及後起的美國等，又建立了強大的國家，比較徹底地拋棄了中世紀的專制主義文化，創造了輝煌的近代文明，將世界文化的發展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。鴉片戰爭以後，中國和西方交手，被打敗了，於是，中國人向西方學習，尋求救國救民之道，產生了林則徐、嚴復、康有為、譚嗣同、孫中山等一批先進人物。陳獨秀、李大釗、魯迅、胡適、錢玄同等新文化運動諸先賢走的，就是林則徐等人所開闢的道路，但是，他們在主張向西方學習的時候，也犯了形而上學、極端化的錯誤，這就是認為好的絕對好，對西方文化評價過高，對其精華和糟粕，缺乏科學的分析。

毛澤東早就提出了完整的文化理論。1940年，毛澤東在《新民主主義論》一文中就指出：“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，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，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；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。”關於吸收外國進步文化問題，毛澤東在《新民主主義論》中也早就指出過：“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，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，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。”毛澤東特別指出：“外國的古代文化，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，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，都應該吸收。”1956年，在《論十大關係》中，毛澤東又進一步將參考、借鑒範圍，從外國古代文化、啟蒙時代的文化，擴展到更廣闊的方面。他指出：“一切民族、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，政治、經濟、科學、技術、文學、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。”當然，他也同時指出，“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”，“不能一切照抄，機械搬運”。“他們的短處、缺點，當然不要學。”我以為，毛澤東提出的這些方針至今還是正確的，應該遵循，不可忘記。

這些年，我們提倡國學，比較著重地強調繼承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遺

產，這是正確的、必要的。我們的民族文化遺產中有許多優秀的部分，可以拿來就用，作為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準則和智慧。有些部分，似乎是糟粕，其實，經過創造性解釋，或創造性轉化，也完全可以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服務。例如，宋明理學所提倡的“克人慾，存天理”，這一命題，曾經被清代唯物主義思想家戴震批判為“以理殺人”，似乎是應該拋棄的糟粕了，但是，有人類，就必然有慾望，而一切人的慾望都應該受“理”——道德倫理和法律、制度的約束。不受制約，聽任“物慾橫流”，其結果必然走向貪污、腐化、掠奪、壓迫，以至於對外侵略的道路。可以說，一切壞事都和“縱慾”相關，而“以理制慾”，將人的慾望置於道德倫理和法律、制度的約束之下，則是人類社會永恆的、普遍的道德要求。如果我們這樣來解釋“克人慾，存天理”這一命題，將之改造為“以理制慾”的道德要求，顯然，對建設廉潔社會、文明社會大有助益。這種態度是否可以稱為“分析繼承”呢？

外國文化，特別是西方文化、西方價值，近年來被有的人視為毒藥，避之唯恐不及。其實，中共從未對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採取完全排拒態度。例如“人權”，自然是地地道道的“西方價值”，我們曾長期加以批判，但是，經過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深刻而慘痛的教訓，我們終於明白了“人權”之不可或缺，因此，毅然將“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”寫入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。又如，民主、自由、平等，都是源於西方、發展於西方的觀念，但是，我們卻毅然將之寫入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”——自然，在解釋、說明、實踐時，會與西方不同或有所不同。可見，我們對西方文化、西方價值，持分析態度。我們要分清何者為社會進步、文明所必須，對中國有益；何者違背社會進步與文明，對中國不利，甚至有害。總的原則是：取其有益者，拒其有害者。這種態度，是否可以稱之為“分析借鑒”呢？

新文化運動距今已有 100 年了。今天的中國正在從事前無古人的事業，全國人民正在努力將中國建設為文明、公正、民主、法治的現代強

國。假如我們對傳統文化、外國進步文化都持有分析的繼承和借鑒態度，就不僅繼承了 100 年前的新文化運動，而且超越了它。

2015 年 4 月 15 日急就，
同年 4 月 29 日刊於《環球時報》，此為原稿

